



白玉光：在狱中同敌人进行斗争



白玉光。

白玉光（1916—1983年），原名白金灵，曾用名魏明、魏世良、李子良，陕西省绥德县张家山村人。8岁入本村完小，1929年高小毕业。

由于革命思想在陕北的传播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，使白玉光的父亲和二伯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受家庭的影响，白玉光幼年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。1927年，加入共青团，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28年，先后担任团支部委员、支部书记。

1930年，小学毕业后，因家境贫困，失学务农。当时，白玉光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从事革命活动，成为一名非常重要的地下交通员，他家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联络点。

1934年5月，白玉光受组织委派到中共绥德县团委，先后任组织部部长、书记。8月，赴河北团省委受训，学习政治、军事和团的知识。通过学习，白玉光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见识，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。学习结束后，去冀东开展游击战争，任省委军事特派员。1935年7月，调中共天津市委任交通干事。9月，在中共冀鲁豫特委领导下的游击二支队任政委。

1936年4月，党组织派白玉光到中共鲁西特委任宣传部部长。1938年3月，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又派白玉光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。同年秋，马鸿逵加紧对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的侦破活动，公开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，中共宁夏工委处境非常危险。1939年1月，为了加强宁夏工作，白玉光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宁夏，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任代课教师，后又转到小坝小学任教。10月，中共中央讨论宁夏工作问题，决定再派崔景岳、王博等人到宁夏，接替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的工作，重建中共宁夏工委。1940年3月，新一届中共宁夏工委成立，崔景岳任书记，白玉光任组织委员，王博任宣传委员。

新一届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后，正当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时，由于中共地下党员杜琳防范意识不强，上了敌人圈套。4月13日，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在省城和平街27号杜琳家中遭敌逮捕，又加上叛徒江生玉为了向敌人献媚，供出了崔景岳交给他的重要文件，从而案情进一步扩大。5月4日，白玉光、王博等中共党员在小坝遭敌逮捕。20天中，先后有3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，中共宁夏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

白玉光被捕后，想得最多的是面临危险如何与敌人作斗争，保护同志，保住党的秘密，与敌周旋。“你在外边认识谁，说说看。”高中弟看白玉光言谈举止充满稚气，想从他口中套出有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。“我认识爹娘和村上的人，还认识县长、保长、甲长，再不认识谁。”白玉光既不惊慌，又不害怕，表现得很坦然。“老老实实说，不说就拉出去枪毙你”高中弟进一步威逼。“坐监就坐监，这里咋还枪毙人呢？”白玉光故作惊讶地答道。

在狱中，敌人给白玉光压杠子施以酷刑，欲使其屈服，但白玉光经受了考验。在一次审讯中，崔景岳故意大声说，“白玉光还是个娃娃，我只派他到中宁送过一封信，别的什么事也没干。”听到此话后，白玉光明白崔景岳是在极力保护同志的安全，从而更加坚定了与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。

经过几次审讯，敌人从白玉光口里什么也没得到，便把白玉光与崔景岳、王博、孟长有等人关进了同一个牢房。在狱中，为了继续与敌人斗争，他协助崔景岳成立了狱中党支部，开展团结难友，抵制

敌人的腐蚀软化和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字的斗争。同时，还给难友讲故事、教唱革命歌曲、搞文娱活动，活跃狱中生活；捻毛线、打毛衣，实行生活自救。狱中党支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大家赞许。

1941年4月17日，崔景岳、孟长有、马文良3位难友牺牲了，狱中反应强烈，白玉光不负众望，继续承担起了狱中党支部的领导工作。他与难友谈心，互相鼓励，增强信心，坚持斗争，不断通过多种方式，赢得一次又一次斗争的胜利，使难友们的受酷刑次数有所减少，沉重脚镣得以摘除，生活也略有改观，体质有所增强。

1949年9月20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马鸿宾八十一军谈判成功，八十一军宣布起义，打开牢门，使身陷囹圄的白玉光与其他难友重见光明。9月22日，白玉光和难友投入到迎接解放宁夏的战斗。当时，宁夏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一位中校和一位上尉，在傍晚找到白玉光，汇报了起义部队中部分汽车兵准备抢掠西塔仓库的物资逃跑等情况，白玉光立即向那位中校索要了一支枪，带着难友王世同、姚怀连等人直奔现场，向驶动的汽车兵及有关投诚人员讲述中国共产党对投诚人员的政策，要求他们放弃逃跑的念头，积极维持市内社会秩序，保护仓库物资和各种设施，争取立功。随后，白玉光写了一些“中国共产党宁夏工作委员会”的封条，让有关人员分别贴在比较重要的地方，以防止重要物资、器材、设备和文物等遭到不应有的损失。处理完毕仓库骚乱事件后，白玉光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取得了联系，建议人民解放军赶快接防，派出巡逻队，维护社会秩序。9月23日晚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银川，宁夏获得解放。9月25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副政委、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在百忙中接见了白玉光及其他地下党员，亲切地询问宁夏地下党在狱中的情况，并征询了如何治理和建设宁夏的意见。

解放后，白玉光在宁夏工作了34年，先后任宁夏民政厅副厅长，西北行政委员会机关党委副书记，陕西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，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，自治区经委副主任，自治区交通局副局长，自治区三届政协常委等职。

1983年3月2日，白玉光因病医治无效，与世长辞，享年66岁。（据银川党史网）

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的诞生

六盘山是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必经之路。红二十五军、中央红军先后翻越六盘山，登顶此山表明红军已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，也意味着长征的胜利。

1935年10月，红军进入今宁夏西吉县境内，当时国民党军为了阻截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，在六盘山一带设置了包括国民党毛炳文两个师、东北军何柱国骑兵部队、门炳岳及西北马鸿宾部队等在内的重兵，形势相当严峻。

10月7日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率领的红军队伍在青石嘴附近与敌军先后进行了两次战斗，共歼敌400余人，缴获战马共计200余匹。还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了中央红军的第二支骑兵侦察连。

“纵览逶迤六盘雄姿，眼底尽收招展红旗，再想到红军北上即将到达目的地，毛泽东在这里吟诵出千古名章也就不足为奇了。”魏晓东说。

在长征途中，毛泽东一面运筹帷幄，扭转乾坤，一面咏志抒怀，先后创作了《十六字令三首》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《七律·长征》《念奴娇·昆仑》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等多首不朽的诗词。这些作品不仅生动地反映了红军长征辗转曲折的行动轨迹，更艺术地再现了红军长征历经困苦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。

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诞生之后，曾历经几次修改，最终形成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这个版本。1961年9月，毛泽东应宁夏领导同志之请，亲笔书写了这首词，赠予宁夏。

如今，在宁夏的六盘山长征纪念馆等纪念景点、各党政机关及高校里，经常可以看到书写的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，它激励着宁夏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前进。（据新华网）

老银川人用电二三事

发电机，发电机负荷小，是专供马鸿逵公馆用电的。“宁夏电灯公司”属官商合办企业。该公司股金省银行官股占50%，商会和绅士富商入股占50%，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，马鸿逵对电灯公司非常重视，担任公司董事长。第一任经理为柴兰亭。

银川人第一次看到电

电灯公司第一天向旧银川城发电时，全城老百姓奔走相告，欢呼雀跃。傍晚，都不约而同拥向柳树巷、新华街街头，驻足观看这个从来都没见过的洋玩意儿。电灯泡发出来的微弱灯光，让久居旧银川的人，第一次见到了电。

马鸿逵公馆（今银川市兴庆区羊甫街路口信义市场位置）的供电线路是由专线直接拉到电灯公司的。这一天晚上，公馆里的楼亭榭台，灯火通明，马鸿逵很不惬意，请来戏班子，为电灯公司开业发电、公馆通电，助兴添彩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发电机运转一段时间后，由于购来的发电机早已老化，时转时停，无法保证正常供电。一天夜晚，马鸿逵正在新华街戏园子看秦腔，突然停电，顿时，戏场漆黑一片，看戏的人乱作一团，纷纷尖叫，马鸿逵以为有人要行刺于他，惊慌失措，于是在卫兵的护卫下回到马公馆。这可把电灯公司经理柴兰亭吓坏了，这“电”新鲜了两天，就歇菜了，而且还惊了自己的顶头上司，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，1936年年初，“宁夏电灯公司”筹措资金，又从北京购进一台35马力单缸卧式煤气机和修理好的25千瓦日本产旧发电机，公司为了保证马公馆全天供电，成立了供电专机组，负责马公馆供电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省政府又拨银购置了更好的发电设备。从北京购进一台200马力柴油机改装的60马力煤气机和100千瓦美国产旧发电机。这在国内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发电机。新的发电机经过组装试调后性能完好，运转正常，发电功率也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，电力也比较充足。截至1949年9月，旧银川城居民家庭用电户为431户，15瓦电灯泡有1673只。

1949年9月，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国民党特务准备

破坏电灯公司设备，电灯公司20多名工人组成护厂队，拿起棍棒，昼夜坚守工厂，特务们来到工厂实施破坏，他们在大门口用人墙守住大门和特务们进行殊死搏斗，直到9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进城，工人们终于把一个完整的工厂交给了人民政府，同年10月，“宁夏电灯公司”改名为“宁夏人民电厂”。

宁夏现代工业的摇篮

改名后的“宁夏人民电厂”，由银川市军管会接管，几名厂军代表全面负责电厂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银川，由于城市用电量激增，原有的发电量远远满足不了城市用电需求。1951年初，银川市政府决定投资建设宁夏第一座新型电厂银川电厂（厂址位于今银川市金凤区大武口巷原银川电力修造厂院内）。

经过一年多艰苦建设，1952年年底，银川电厂竣工，安装的第一台500千瓦汽轮发电机试机成功，并正式发电。这是银川人民生活当中的一件大喜事，当时宁夏省委、省政府，银川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和银川市各界人士及数千名群众前去祝贺。银川电厂的建成，新增发电设备总容量达728.63千瓦，年发电量达45.15万千瓦，不仅满足了银川工业和城市用电，还为石嘴山、大武口等地供电。

新建成的银川电厂有职工500人，与当时的银川毛纺厂、银川修理工厂并称为宁夏的“三大厂”。银川电厂曾涌现出秦武麟等全省和全国劳模。该厂的劳动生产、增产节约、半工半读培训、青年团工作在当时来说都大有名气，是当时西北，乃至全国的明星企业之一。

1958年10月，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，开创了宁夏电力事业的新时期，这一年，青铜峡水电站开工建设，1959年9月，中卫电厂建成投产发电，1959年12月，石嘴山发电厂投产发电，1960年11月，银川电厂和石嘴山发电厂的发电总容量日渐缩小，耗能高，成本大，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，1964年，银川电厂正式停产发电，从而完成了银川电厂12年的历史使命。（据《国家电网报》）

大生产运动与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

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，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乡村问题的紧迫性、严峻性，进行了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的尝试，但效果很不理想。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乡村问题，认为“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”。抗战时期，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，基于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系统的乡村社会经济建设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、农村社会组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

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一年，毛泽东说：“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，没有油吃，没有纸，没有菜，战士没有鞋袜，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。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，企图把我们困死，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。”

为解决燃眉之急，边区政府只能采取加征救国公粮的办法。但沉重的财政负担，很快引起了民怨。如何克服困难呢？办法有两个：一是做减法，减征公粮（1942年的公粮由原定的19万石降为16万石），精简简政（减少脱产人员数量），减轻农民负担；二是做加法，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，增加农业产出。由此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。

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，毛泽东作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》报告时指出：“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，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。”在大生产运动中，边区农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按照不同情况，确定了“耕一余一”“耕二余一”“耕三余一”的粮食生产计划，普遍成立耕种交工队、锄草扎工队。除种好原有耕地外，还鼓励农民积极开垦荒地，开展生产竞赛，踊跃交粮、交草，参与运盐、纺纱、兴修水利、为军烈属代耕等活动。在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同时，中共中央进一步完善以减租减息为核心的租佃制度改革，有效调动了乡村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。在减租过程中，边区各地还成立了农会、租佃会、减租会等民众组织，专门负责处理减租和农民佃权的保护事宜。

经过两年左右的艰苦奋斗，基本实现了自力更生、丰衣足食，边区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。1943年，延安东山区黄蒿洼后沟农民曹富说：“过去吃的是高粱、稀米汤，现在已经为白面条、馍馍、干米饭所代替了。端午节全家聚餐，吃着鸡肉酒菜。”

给农业生产做好加法

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，不仅取决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更取决于耕作技术、良种推广、生产组织形式、生产资金等要素的配合。边区大部分地方的耕作方式相当粗放。为达到“耕二余一”的增产任务，边府要求普遍提高耕作技术，以提高作物产量。另外，延安各地农民过去种地基本不施肥，经政府提倡后，各地更加注意积肥了，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检粪。农民采用各种方法增加肥源，如多养牲畜勤垫圈，多建厕所勤拾粪，沤柴草、挖炕灰和垃圾土等。

发放农贷支持农村经济发展，是边区金融工作的中心之一。1941年12月15日，根据陕甘宁边区银行提议，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农贷委员会，以李鼎铭、高自立等7人为委员。随后，各县也相应成立农贷委员会或办事处。1942年1月，边区政府制定《边区农贷的基本任务和目前的实施办法》。1943年初，根据毛泽东提议，边区政府结合实际先后制定《三十二年度（1943）农贷实施办法》《农贷小组暂行组织办法》《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》等。边区农贷分为生产、副业、供销、农田水利等四类。农贷利率长期月息1分，短期月息1厘，以一年为期。1942年，边区银行共发放植棉贷款96万余元，使边区棉花面积扩大了一倍，棉产量由50万斤上升到140万斤。青苗贷款是为解决农作物生产过程中，农民生产生活资金困难，打击高利贷活动设置的。据统计，1942年，边区银行在延安、延川县、延长县，共发放棉花青苗贷款46万余元，折合棉花11989斤。农田水利贷款一般由边府建设厅发放，银行协助。1945年至1946年春，边区政府在子长县共发放水利贷款600万元，新修水地316亩，补修水地609亩，增产粮食300余石。

在利用和改造各种民间劳动互助形式，组织群众发展农副业、手工业、运输业的同时，也使旧的劳动互助组织具备了新的性质：限制剥削，奖励劳动，打破了小农经济的第一个限制——分散的个体劳动。1943年11月29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号召，“把群众组织起来，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、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、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，只要是可能的，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，组织起来，成为一支劳动大军。”经提倡，边区各地普遍流行扎工、变工、锣鼓班子等劳动互助形式，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。

给乡村社会一个新面貌

为建设模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，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革除陋俗恶习，并通过宣传新风尚，刷新民众精神世界，改变边区乡村的社会面貌。

改造二流子，是从延安开始的一场群众运动。据边区政府建设厅调查，1937年前，延安市人口不到3000人，而流氓、地痞将近500人；延安总人口为3万左右，流氓、地痞为1692人；边区其他各县的情况与延安大致相似。1940年春，延安县委在庙沟乡召开生产动员大会，提出让二流子参加生产。至1941年底，延安二流子减少了72%。延安县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，毛泽东称赞：“延安县同志们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。”2月14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改造二流子》，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二流子的经验。3月4日至5日，中央生产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各部队、机关、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，朱德指示：“在生产中，不许有一个败家子、一个二流子。”至此，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达到高潮。经过各方面的努力，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，增加了劳动力，巩固了社会安定。

吸食鸦片，是旧社会给陕甘宁边区民众的恶习，严重影响经济建设与社会风气。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绝烟毒的主要方式为立法、查禁和发动民众监督等，主要做法是禁绝种植，严查鸦片走私贩卖，改造嗜好鸦片者。为查禁及处理边区范围内烟毒犯罪活动，1942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，后来又任重要城镇设立禁烟督察分处。1943年9月11日，边区政府发出《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公署县（市）政府的指示信》，对帮助烟民戒烟提出了具体要求，号召形成群众性的戒烟运动，发动烟民进行戒烟竞赛。至抗战胜利，边区吸食鸦片者近乎绝迹。

模范村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新生物。模范村建设，是从延安开始的。陕甘宁边区第一个模范村，就是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吴家枣园村。1943年11月，西北局劳动英雄大会号召，“劳动英雄要成为团结和推动一个村一个乡群众生产的核心和旗帜。”劳动英雄吴满有率先响应毛泽东“组织起来”和西北局的号召，将吴家枣园村的模范生产经验，推广到整个延安县柳林区二乡，使其成为模范乡。受此启发，更多的劳动英雄纷纷表态，准备将个人的生产经验扩大到全村使其成为模范村。1944年，边区模范村建设进入高峰，涌现出生产模范村、文化模范村、卫生模范村、运盐模范村、纺织模范村等。模范村建设不仅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继续向深入发展，而且对农村社会改造及农民教化的作用也十分突出。（据《中国组织人事报》）